

# 《三國志》與《後漢書》「《春秋》書法」比較\*

林盈翔\*\*

## 摘要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本是經學，但《春秋》也是史學的「百代不祧之宗」。歷來史家撰著之時，無不標舉「懲惡勸善」、「微言大義」的《春秋》書法，並以其為著書最高鵠的。《三國志》與《後漢書》，同居中國史學冠冕的「四史」之列，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而兩書的時代前後相銜，史事人物內容亦有重疊，多有學者討論兩者的書法異同。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下，加之以《春秋》書法的理論視角，進而分析、探究陳壽與范曄兩人對於《春秋》書法的理解與使用。以「《春秋》書法與正統論」與「《春秋》書法的兩種面向：直書與晦書」兩端加以開展，指出過往研究衡定范曄書法優於陳壽者，其書寫意識可能與正統論相關，不當以此為《春秋》書法之定論。而肇因兩人所處時代環境不同，兩人所使用的《春秋》書法亦有不同，載筆之用仍是「懲惡勸善」，但載筆之體卻有直書與晦書之分。《春秋》書法作為一可被歷史書寫實踐的方法學，其效用邊界與概念意涵，在《三國志》與《後漢書》的比較下，當可見其幽微變化。

**關鍵詞：**《三國志》、《後漢書》、《春秋》書法

---

\* 本文為 109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劉知幾《史通》「《春秋》書法」觀析論——以《三國志》為問題進路」(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31-068-) 部分成果。初次發表於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第十八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會議日期：2022 年 3 月 18、19 日。經特約討論人許聖和教授教授與匿名審查人指出問題、惠賜建議，後學獲益匪淺，並已一皆修改。對於國科會與諸位師長、前輩學者的幫助，於此謹致謝忱。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Comparison in the "Chun Qiu Shu Fa"**

**Lin Yin-Hs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Abstract**

"Chun Qiu" is a classics, but it also serves as a standard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scholars have consistently cited the "Chun Qiu Shu Fa", emphasizing its principles of "punishing the wicked and encouraging the good" and "conveying profound meanings with concise language," regarding it as the highest standard for historical texts.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are considered the pinnacle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Four Histories." Their significance is paramount, and due to the chronological overlap and thematic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works, scholars often discuss thei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uilding upon the research of predecessors, this article tak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hun Qiu Shu Fa"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understanding and usage of this "Chun Qiu Shu Fa" by two historical figures, Chen Shou and Fan Y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revious notion of Fan Ye's superiority over Chen Shou might be related to orthodoxy, and it cautions against using this as a definitive judgment on the "Chun Qiu Shu Fa". The differing historical contexts in which Chen Shou and Fan Ye lived influenced their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s and usage of the "Chun Qiu Shu Fa", even though both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s of "punishing the wicked and encouraging the good." However, their calligraphic styles differ, with distinctions between direct and indirect writing. The "Chun Qiu Shu Fa" serves as a practical methodology for historical writing, and its boundaries and conceptual implications can be seen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This allows us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and variations of its utility.

**Keywords: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Chun Qiu Shu Fa"**

## 壹、前言

《新唐書·選舉志》：

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sup>1</sup>

由引文可看出，《史記》、前後《漢書》、與《三國志》此四本史書，被唐人列為選舉考試之科目，唐人已隱隱然將《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四書並列。至於今人所熟知的「四史」並稱之名，出現當是較晚，要遲至清朝方才定名。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

直至唐、宋以來，學者恒言乃皆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於竊以為宜更益以陳壽，稱《四史》，以配《五經》，良可無愧，其餘各史，皆出其下。<sup>2</sup>

王鳴盛此條主論三史之說，其爬梳歷代各類說法後，乃倡言「宜更益以陳壽，稱《四史》」。而與王鳴盛約略同時期的史珥，亦著有《四史剿說》，民國初年則有李景星《四史評議》、劉咸忻《四史知意》等等。是以就目前的史料觀察，「四史」之說可能成熟於有清一代。確實，將四史並稱者，除因其為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外，也因此四書有較高的水準表現，「其餘各史，皆出其下」。另一方面，四史與其他正史相比，乃個人撰史，成其「一家之言」。特別是在唐代史官制度確立後，乃群體著述，其史家個人色彩越發模糊。<sup>3</sup>所以此四位史家，在記載客觀史事之餘，實也將史家的主觀心識，蘊藏於史筆之中，如本田濟先生便稱《史記》為「悲憤之史」、《漢書》為「矜持之史」、《三國志》為「畏懼之史」。<sup>4</sup>當代的史學觀念，大抵也能襄贊此一觀點：

任何為真相而著之史書，均不能於其中免除意識形態成分。<sup>5</sup>

不論歷史的可驗證性多高，可接受性或可核對性多廣泛，它仍然不免是個人思維的產

<sup>1</sup> 北宋·歐陽修等著：《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162。

<sup>2</sup> 清·王鳴盛撰，陳文和、王永平、張連生、孫顯軍校點：《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237。

<sup>3</sup> 二十四史中，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雖是屬名史臣個人，然為受詔所著，短時間完成，實為群策之力。由此分判，前四史當是個人撰史，相較之下更能於史筆中蘊含史家心識。

<sup>4</sup> 本田濟〈陳寿の三国志について〉：「『史記』を『悲憤の史』、『漢書』を『矜持の史』、『三國志』を『畏懼の史』と評している。」轉引自〔日〕渡邊義浩：「陳寿の『三国志』と蜀學」，收入三國志學會編：《狩野直禎先生傘寿記念三國志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頁354。

<sup>5</sup> 〔美〕海登·懷特（Hyden White）著，劉世安譯：《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上冊，頁24。相關論述亦可參〔美〕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科院，2003年）。〔美〕海登·懷特著，董立河譯：《話語的轉義——文化批評文集》（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北京：大象出版社，2011年）。

物，是歷史學家作為一個「敘述者」觀點的表示。<sup>6</sup>

換言之，史籍的編寫，不論如何力求客觀，也必然會帶有史家個人的觀點、史識於其中。而前四史，正因是個人撰史，是以更容易於史文中探求其相對統一與完整的史家心識與《春秋》筆法。

四史之中，《史記》與《漢書》；《三國志》與《後漢書》，也因載事略有重疊，而常被相互比較、品論優劣高低。《漢書》問世後，馬、班優劣之論遂起，如東漢王充《論衡·超奇篇》持論班固為甲：「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sup>7</sup>晉時張輔〈名士優劣論〉則以史公為勝：「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失。」<sup>8</sup>相關討論更是聚訟千年，至今仍為學者所樂道。《三國志》與《後漢書》則不然，一如王鳴盛所言，唐宋以降，皆以三史為名，《三國志》往往被忽略，自然也較少與《後漢書》相互比較、並肩。要到明清之際，隨著《三國志》地位的提升，陳、范的優劣異同，方有較多討論。如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

陳壽簡質，差勝范曄，然宛縟詳至，大不及也。<sup>9</sup>

便以繁簡為切入視角，比較《後漢書》與《三國志》間的優劣異同，認為《三國》「簡質」，而《後漢》「宛縟詳至」。清代趙翼《廿二史劄記》，更是專節討論「《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sup>10</sup>，又如何焯《義門讀書記》、<sup>11</sup>牛運震《讀史糾謬》、<sup>12</sup>李景星《四史評議》、<sup>13</sup>劉咸炘《四史知意》<sup>14</sup>等，皆有涉及兩書間的比較。要言之，馬班優劣，東漢以降一直都是學者討論的焦點；而陳、范間的比肩爭長，則有待《三國志》地位的提升，在有清一朝同列「四史」後，議題方有較長足的開展。當代學者對於《三國志》與《後漢書》間的優劣比較，亦是多所討論，較有代表性者，如鍾書林先生《范曄之人格與風格》，便持論范曄為長；<sup>15</sup>而李純蛟先生《三國志研究》，則立主陳壽為先。<sup>16</sup>大抵仍是以其研究的本位立場，各持己見的狀態。

對於「《春秋》書法」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於此不再具論。<sup>17</sup>大抵《左傳》成公十四

<sup>6</sup> [英] 凱斯·詹金斯 (Keith Jenkins) 著，賈士衡譯：《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年)，頁96。

<sup>7</sup> 東漢·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15。

<sup>8</sup>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收入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409。

<sup>9</sup> 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頁109。

<sup>10</sup> 於後會專節討論，於此暫且按下不表。

<sup>11</sup> 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sup>12</sup> 清·牛運震著，李念孔，高文達，張茂華點校：《讀史糾謬》(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社，1989年)。

<sup>13</sup> 李景星著，韓兆琦、俞樟華校點：《四史評議》(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

<sup>14</sup> 劉咸炘著，黃曙輝編校：《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sup>15</sup> 鍾書林：《范曄之人格與風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179-231。

<sup>16</sup> 李純蛟：《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153。

<sup>17</sup> 參肖峰：〈百年「春秋筆法」研究述評〉，《文學評論》2(2006年4月)，頁178-186。張金梅：〈近

年「《春秋》五例」<sup>18</sup>的體、用之分，解釋效力最為明確：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sup>19</sup>

前四者為載筆之體，「懲惡而勸善」則是載筆之用。是以「《春秋》書法」的兩大內涵，一是「懲惡勸善」的內容思想，是孔子藉《春秋》寄寓邦國人倫之情、善善惡惡之理。即昭公三十一年「善人勸焉，淫人懼焉」，<sup>20</sup>孟子、馬遷所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sup>21</sup>、「《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sup>22</sup>其目的同於《周禮·天官·宰夫》所云：「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sup>23</sup>以經世贊治為最終依歸。二則「微婉顯晦」的修辭文法，具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微而顯，婉而辨」的呈顯手法、風格特色，對後世史書撰寫、文學理論皆有深遠影響，<sup>24</sup>其風格大抵可用「尚簡」、「用晦」二者概括之。<sup>25</sup>而方苞的「義法說」，

三十年國內外「《春秋》筆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蘭州學刊》155（2006年8月），頁54-57。

<sup>18</sup> 「《春秋》五例」之說，首見杜預〈春秋序〉：「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參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16。肖鋒先生曾就其來源、命名原則分為「例」、「義」、「筆」三類，加以討論。參肖鋒：〈從「《春秋》書法」到「春秋筆法」名稱之考察〉，《北方論叢》2（2009年2月），頁10-13。

<sup>19</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465-1。

<sup>20</sup> 參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930-2。

<sup>21</sup>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118。

<sup>22</sup> 西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943。

<sup>23</sup>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47。牟宗三先生亦以「掌官書以贊治，正歲年以序事」解釋中國史官職掌的觀念形態。參牟宗三：《歷史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6-14。

<sup>24</sup> 「《春秋》的『微言大義』，確實成為了中國文人公認的並努力效法的權威學術話語。」參王基倫：〈「《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國文學報》39（2006年6月），頁1-34。亦可參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102-111，〈「春秋筆法」對於後世文論的影響〉。

<sup>25</sup> 「尚簡用晦是「春秋筆法」的基本特徵，是《春秋》對「詩三百」比興寄託手法的借用和發揮，意在追求「一字定褒貶」的美刺效果。」參李洲良：〈春秋筆法的內涵外延與本質特徵〉，《文學評論》1（2006年1月），頁91-98。

<sup>26</sup>章學誠以「敘事」釋《春秋》書法，<sup>27</sup>錢鍾書先生以「修辭」目之<sup>28</sup>等，也同屬相對較為側重表現手法、文章營造的切入與詮釋。張高評先生釋之曰：

歷代所謂《春秋》書法，可歸納為二類：其一，側重內容思想者，如《左傳》所謂「懲惡而勸善」，「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以及《公羊》學家闡揚之「微言大義」，多屬焉。其二，側重修辭文法，如《左傳》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微而顯，婉而辨」，杜預所謂的正例變例，皆屬之。<sup>29</sup>

當然，《公羊》側重《春秋》大義，其「微言大義」更為複雜，如論「三科九旨」<sup>30</sup>等，後世經學家亦是多所開展。<sup>31</sup>然此種載筆之體側重修辭文法微婉顯晦；載筆之用側重內容思想懲惡勸善的詮解方式，大抵可得「《春秋》書法」較為廣義的內涵特質與意義邊界。<sup>32</sup>

《春秋》誠為中國史學百代不祧之宗，「二千五百年來之典型」。<sup>33</sup>《春秋》書法懲惡勸善的核心概念，亦是中國史書撰寫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以史家如何使用《春秋》書法，也成為重

<sup>26</sup> 〈又書貨殖傳後〉：「《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參清·方苞：《望溪先生全集》，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2，頁40。〈古文約選序例〉：「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參清·方苞：《望溪先生全集》，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22冊，頁97、310。

<sup>27</sup> 〈上朱大司馬論文〉：「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原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參清·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頁1371。案，「比事屬辭」/「屬辭比事」即是《禮記·經解》所云「《春秋》之教」，也可說是「《春秋》書法」的重要內涵。「屬詞比事」其意涵與開展甚豐，已於博士論文中專章討論。亦可參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年）。趙友林：《《春秋》三傳書法義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9年）。

<sup>28</sup> 「《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辭。」參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頁1533。

<sup>29</sup>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頁155-156。

<sup>30</sup> 出自徐彥疏文，參東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7。

<sup>31</sup> 如楊濟襄先生論孔廣森對何、徐二人「三科九旨」之發揮，黃梓勇先生論章太炎引《公羊》「三科九旨」彌合、說解《左傳》。參楊濟襄：〈孔廣森《公羊通義》與何休《公羊解詁》釋經觀點之異同〉，《經學研究集刊》13（2012年10月），頁67-100。黃梓勇：〈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5（2009年9月），頁161-188。

<sup>32</sup> 沈玉成、劉寧兩位先生也持相同看法：「歷來的經學家和史學家，談到《春秋》，總離不開所謂『義法』。義，指大義，也就是所包含的深刻內容；法，指『書法』，也稱『書例』，就是記事的體例都有嚴格的方法和規格，各種『書例』都表達某種褒貶的態度。兩者又統一而不可分，『義』通過『例』而表達，『例』則是『義』的載體。」參沈玉成、劉寧著：《春秋左傳學史稿》（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38。

<sup>33</sup> 錢穆：〈中國史學之特點〉，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年），頁1100-1101。

要的研究課題。其中《史記》《春秋》書法的研究開展最廣，<sup>34</sup>而《漢書》、<sup>35</sup>《三國志》與《後漢書》，其研究當都還在起步的階段。本文所欲討論的《後漢書》，鍾書林先生《范曄之人格與風格》<sup>36</sup>，其中第五章專節談論《後漢書》的春秋褒貶。<sup>37</sup>《三國志》的部分，有博士論文《《三國志》「《春秋》書法」研究》，<sup>38</sup>近五年內亦有三本碩士論文參與討論。<sup>39</sup>業師張高評先生，亦有新作。<sup>40</sup>要而言之，雖《三國志》、《後漢書》兩者間的比較，已有所討論與關注。但對兩書《春秋》書法研究的開展，晚近《三國志》研究漸增，而《後漢書》仍可多所開拓。但也同於前述《三國志》與《後漢書》間優劣比較的研究現況，也都是以其研究本位各持己見，而少有對話。<sup>41</sup>是以聚焦在兩書《春秋》書法的比較研究，目前當還有可再拓深的空間。以下便以「《春秋》書法與正統論」與「《春秋》書法的兩種面向：直書與晦書」兩端，次第論之。

## 貳、《春秋》書法與正統論

當前學界對《三國志》與《後漢書》兩者的《春秋》書法比較研究，最早做出系統性論述的，當是趙翼《廿二史劄記》：

陳壽〈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蔚宗〈獻帝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爲丞相。〈獻帝紀〉則曰曹操自爲丞相。〈魏紀〉，天子使郝慮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獻紀〉則曰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坐與父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曰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爲魏王，〈獻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魏紀〉，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巨討斬之。〈獻

<sup>34</sup> 略舉重要者如阮芝生：〈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臺大歷史學報》23（1999年6月），頁1-59。張高評：〈《史記》筆法與《春秋》書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頁57-104。林聰舜：〈《史記》的「微言」敘事——「書法不隱」與「隱」的統一〉，《清華中文學報》5（2011年6月），頁89-122。

<sup>35</sup> 潘銘基：《《漢書》及其春秋書法》（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sup>36</sup> 鍾書林：《范曄之人格與風格》。鍾書林先生另有《《後漢書》文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sup>37</sup> 單篇有楊朝菁：〈論范曄《後漢書》帝后紀論中的「春秋筆法」〉12：4（2010年12月），頁87-91。大抵整理功多。

<sup>38</sup> 林盈翔：《《三國志》「《春秋》書法」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

<sup>39</sup> 陳義彬：《陳壽《三國志·魏書》之《春秋》書法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李俊安：《《三國志·魏書》書法抉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楊凱嵐：《《三國志》的「微言」敘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sup>40</sup> 張高評：〈《春秋》筆削見義與傳統敘事學——兼論《三國志》《三國志注》之筆削書法〉，《文史哲》1（2022年1月），頁1-14。

<sup>41</sup> 如李純蛟先生《三國志研究》、鍾書林先生《范曄之人格與風格》，便是各自持論所研究的對象，書法爲高。相關討論於後會再深入。

紀〉則曰耿紀、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禪代之際，〈魏紀〉書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張音奉璽綬禪位。〈獻紀〉則曰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誅，皆書操殺。此史家正法也。<sup>42</sup>

趙翼詳細比較〈武帝紀〉與〈獻帝紀〉，一連羅列七例，聚焦討論兩書對曹操紀載的差異。如《三國志》載「以公爲丞相」、「策命公爲魏公」、「進公爵爲魏王」，最終至漢帝「奉璽綬禪位」於曹丕。<sup>43</sup>《後漢書》則是「自爲丞相」、「自立爲魏公」、「自進號魏王」，末為「魏王丕稱天子」。<sup>44</sup>又如伏完、董承、耿紀、韋晃等人，在《三國志》為謀反，《後漢書》中則為起義了。最終下結論，認為范曄所書，方是「史家正法」。而這樣的觀點，也多有學者接受，如鍾書林先生便在趙翼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論述，並結論曰：

要之，《後漢書》是繼《春秋》之後，頗得褒貶筆法的，其史法和史德，不消說《三國志》比之而黯然失色，就連《史記》亦是比之不及的。<sup>45</sup>

鍾氏此一結論，大抵是承趙翼的提法而來。而《三國志》與《後漢書》《春秋》書法比較，可論性最高者，實為〈武帝紀〉與〈獻帝紀〉間的比較。另一方面，對於鍾書林先生此處的論述，本文是持保留態度的，會再於下節析論。趙翼又進一步申論曰：

自《三國志·魏紀》創爲迴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爲式，延及《舊唐書》、《舊五代史》猶皆遵之。其間雖有習鑿齒欲黜魏正統，蕭穎士欲改書司馬昭弒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歐陽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書》，始改從《春秋》書法，以寓褒貶。而范蔚宗於《三國志》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sup>46</sup>

趙翼認為陳壽在〈武帝紀〉中多所迴護，延及《舊唐書》、《舊五代史》等，在易代之際，皆為後來的朝代有所隱晦，直至歐陽修方以《春秋》書法有所改寫、寄寓褒貶。趙翼亦立論陳壽《三國志》的「迴護書法」，乃是因晉承魏統，故欲為晉迴護，當先為魏迴護。<sup>47</sup>然由「習鑿齒欲黜魏正統」一語，可知問題的核心在於，曹魏立國是否為「正」，是否為「正統」。

正統論者，饒宗頤先生論曰：

治史之務，原本《春秋》，以事繫年，主賓明分，而正閏之論遂起。歐公謂：「正統之說始於《春秋》之作」是矣。正統之確定，為編年之先務，故正統之義，與編年之書，

<sup>42</sup> 清·趙翼著，曹光甫校點：《廿二史劄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79。

<sup>43</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0、37、47、62。

<sup>44</sup>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85、387、388、390。

<sup>45</sup> 鍾書林：《范曄之人格與風格》，頁216。

<sup>46</sup> 清·趙翼著，曹光甫校點：《廿二史劄記》，頁79。

<sup>47</sup> 「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迴護，不得不先為魏迴護……及禪位於司馬炎等事，自可一例敘述，不煩另改書法。此陳壽創例之本意也。」參清·趙翼著，曹光甫校點：《廿二史劄記》，頁81。



息息相關，其故即在此也。<sup>48</sup>

一如《春秋》以魯十二公紀年述事，當在編纂史書之時，先務乃以事繫年。然所繫年號該當為何，便有主賓之別、正閏之分了，是以歐陽修力主「正統之說始於《春秋》之作」，〈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sup>49</sup>

《公羊傳》隱公三年：「故君子大居正。」<sup>50</sup>《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sup>51</sup>歐陽修將正統之名繫於《春秋》，亦以《春秋》大義建構其對於正統論的理解，在在皆能看出兩者交涉頗深。而三國乃是在秦漢一統後，首次面對「分裂」此一課題，是以後世對正統論的相關討論，不免皆會聚焦在三國時代之上。<sup>52</sup>《三國志》就體例言僅魏書有紀，故陳壽當是以曹魏為正統，而習鑿齒乃是第一個提出以蜀漢為正統的史家，《晉書·習鑿齒傳》：

是時溫覬覬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sup>53</sup>

值得注意的是，由《晉書》本傳的記載言，習鑿齒以蜀漢為正統，乃是為了「裁正」桓溫「覬覬非望」，實則是以三國歷史為例，警告桓溫「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等於是對三國正統的討論，其實是具有當代性目的，或必然受當代環境影響的。《四庫全書》《三國志》提要：

其書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乎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

<sup>48</sup>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國史學觀念探討之一》（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79年），頁1。

<sup>49</sup> 北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75。

<sup>50</sup> 東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29。

<sup>51</sup> 東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9。

<sup>52</sup> 正統論相關研究可參趙令揚：《關於歷代正統問題之爭論》（香港：學津出版社，1976年）。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07年）。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年）。

<sup>53</sup>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2152-2154。

以一格繩也。<sup>54</sup>

四庫館臣所論甚明，也不僅是習鑿齒，後世史家對三國正統論的討論，往往都是借他人酒杯，澆自身塊壘。是將當代的政治環境與問題，投射到三國時期，欲藉由建構三國的正統，來強化自身立場。故如「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是以北宋諸人皆以曹魏為正統；可一旦「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則南宋史家便以蜀漢為正統。以司馬光《資治通鑑》與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為例，便能見其端倪。

再進一步言，此種價值判斷於范曄亦同。范曄身處南朝東晉至劉宋政權，於時中原故地皆在北魏手中，情勢有類蜀漢。若以此一視角切入，則其〈獻帝紀〉中貶抑曹魏的書法，無疑能尋得其根據。李純蛟先生便也對此批評道：

范曄這種書法，明顯是為帝蜀抑魏服務的。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我認為趙翼由范書與陳書的對比中得出范書為正法，壽書為曲筆維護的結論，是很值得商榷的。我們怎能把范曄那部帶有強烈的政治偏見和以自我利益為價值判斷標準的《後漢書》，當作鏡子來比照《三國志》呢？<sup>55</sup>

「帝蜀抑魏」同屬正統論的問題範疇，李氏批評《後漢書》頗為激烈，或許持論稍過，但確實也點出了趙翼的一些盲點，即范曄的對於三國正統的看法，實則會影響其〈獻帝紀〉中對曹操的褒貶與書寫。故此處必須思考的問題在於，范曄在〈獻帝紀〉中的書法，究竟是屬於「懲惡勸善」的道德價值判斷，亦或是「正統論」的政治價值判斷？前者自無問題，但若是後者，那以《春秋》書法的角度言之，便不具「何以書」的褒貶大義了。

此問題可以分幾個層次梳理，先是《尚書·堯典》、《周易·革》：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sup>56</sup>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sup>57</sup>

引文所述為堯舜禪讓與湯武革命，兩者可說是改朝換代的兩種模式。後世鼎革之際，幾乎都是循此建構自身的正當性。再者《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sup>54</sup>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二冊，頁973。

<sup>55</sup> 李純蛟：《三國志研究》，頁153。

<sup>56</sup>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18。

<sup>57</sup>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111。

矣，未聞弑君也。」<sup>58</sup>

上位者若仁義不興、為禍社稷，則臣子以道誅之，如湯放桀、武王伐紂，孟子認為此種情況不當稱為「臣弑其君」，而是「誅一夫」。以此論之，臣之代君正當與否，背後實有仁義道德為判準，禪讓自不待言，革命亦然。

故再往下推論，曹操固然有志代漢，然其代漢之舉，全然無功於黔首嗎？此間誠有討論空間。如裴松之便論曰：

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

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sup>59</sup>

裴松之亟論曹操乃「仗順而起，功以義立」，且漢室早已衰微，若非曹操，則「黔首之類殄矣」。故曹魏代漢，自可以正統居之。又如蘇軾〈正統論三首·辯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sup>60</sup>

蘇軾引歐陽修與章望之二人說，加以辨析立論，並以歐陽修之說為長。章望之認為曹魏取天下而無功德，僅能為霸統、不可為正統。<sup>61</sup>然蘇軾力主「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三國時期既「德同力均」、「德無以相過」，則將正統與最強之魏並無不可。此即同於歐陽修「三代之興皆以功德」、「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跡之如何爾」<sup>62</sup>的觀念，仍是採德先跡後的論述原則。

但劉知幾《史通》卻持不同看法：

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

<sup>58</sup>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2679-2680。

<sup>59</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1221、332。

<sup>60</sup> 北宋·蘇軾著，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4，頁121。

<sup>61</sup> 王霸、義利之辨，是另一組可與正統論相參照的關鍵詞，也可在理論上溯源至《春秋》尊王攘夷之說，此也為宋代正統論的重要課題。可參劉德明：〈「王霸之辨」在《春秋》解經中的運用與反省——以朱熹及張洽的觀點為核心〉，《中正漢學研究》27（2016年6月），頁117-142。

<sup>62</sup> 北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魏論〉，頁282；〈東晉論〉，頁283。

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sup>63</sup>

劉知幾認為劉備方是「仗順而起」，且其人格道德「終始無瑕」。反之曹操卻是「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且批評陳壽《三國志》以「魏為正朔」、「蜀乃僭偽」，故「曲稱曹美，虛說劉非」。最終再舉習鑿齒為例，認為正統繫於蜀漢，方為「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有趣的是，毛宗崗〈讀三國志法〉持論亦與劉知幾相同：

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閔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閔運者何？晉是也。魏之不得為正統者何也？論地則以中原為主，論理則以劉氏為主……夫劉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為正統。迨乎劉氏已亡，晉已混一，而晉亦不得為正統者，何也？曰晉以臣弑君，與魏無異，而一傳之後，厥祚不長，但可謂之閔運，而不可謂之正統也……高帝以除暴秦、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興；光武以誅王莽而克復舊物；昭烈以討曹操而存漢祀於西川。祖宗之創之者正，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泛一為正統，而謂昭烈之偏安非正統也。<sup>64</sup>

毛宗崗<sup>65</sup>同樣批評曹魏「以臣弑君」，於仁德有損。並言蜀漢乃「祖宗之創之者正，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將其正統性繫在除暴秦、誅王莽，此種儒家弔民伐罪的道德觀念之上，言下之意，也同是在指責曹魏代漢不具弔民伐罪的道德正當性。

行文至此，至少以三國為例，可以發現後世學者在建構正統之時，會縮合儒家的道德觀、《春秋》觀於其中。曹操一方面雄才大略、安家定邦；另一方面卻也是果忍敢殺、衝突禮教。故論者與褒與貶，各取所需，但正反雙方論述時卻又同時力求符合儒家的道德價值。正統論的建構，其目的可能是為當代政治服務、反映當代政治價值。然其建構的方法、論述的過程，卻是具有道德意義的，更可與「懲惡勸善」的《春秋》褒貶相連結。是以回到一開始的問題意識，我們實則無法準確釐清、判斷，范曄在〈獻帝紀〉中對曹操的褒貶，是正統論影響下的擁劉抑曹，還是秉於善善惡惡的《春秋》褒貶精神，又或者是同時具有政治價值判斷與道德價值判斷兩者。

<sup>63</sup>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白玉崢校點：《史通通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頁195。

<sup>64</sup> 清·毛宗崗評訂：《三國演義》（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頁6-7。

<sup>65</sup> 此處毛宗崗自是就《三國志演義》而論，然其論述內容實為歷史而非小說，故可為討論。

而目前學界多以〈武帝記〉、〈獻帝紀〉兩者對比，衡斷陳壽、范曄之優劣，如李景星《四史評議》：

讀《後漢書·獻帝紀》，須以《三國志·魏武紀》參之，乃見其妙。蓋一時勸懲寓乎國法，千載是非在於忠臣……所謂一字之貶，嚴乎斧鉞者矣。陳志《魏紀》，敘次不謂不高，辭意之間亦不謂無含蓄，但按之書法，究不及此。<sup>66</sup>

李景星持論與趙翼相仿，並言范曄《後漢書》乃「勸懲寓乎國法」、「一字之貶，嚴乎斧鉞」，認為陳壽「書法究不及此」。范曄確實使用了《春秋》載筆之體，但其載筆之用，是根源於正統論（政治判斷）還是《春秋》書法（道德判斷），則顯得啟人疑竇。加之正統論在建構之時又往往綰合儒家道德觀、《春秋》觀於其中。故在處理陳、范《春秋》書法比較之時，正統論與《春秋》書法的複雜疊合，<sup>67</sup>實是必須納入考慮，卻又難以論定的課題。但在本節的推論之下，當可發現僅以〈武帝記〉、〈獻帝紀〉兩者對比，據而推論范曄《春秋》書法優於陳壽，此間判斷應是不夠準確的。

## 參、《春秋》書法的兩種面向：直書與晦書

《論語·憲問》：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sup>68</sup>

孔子認為若國家政治清平，則可言語正直、行為端正；然若國家政治昏瞶，則雖行為仍要端正，但說話卻要委婉謙遜。此一觀念當可理解為《春秋》書法「微婉顯晦」的思想基礎：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sup>69</sup>

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杜預《春秋左傳正義·序》）<sup>70</sup>

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劉知幾《史通·六家》）<sup>71</sup>

<sup>66</sup> 李景星著，韓兆琦、俞樟華校點：《四史評議》，頁272。

<sup>67</sup> 三國時代，正統論、對政權的態度，也直接影響史家撰史，形成政治判斷（正統論）與歷史判斷的矛盾與衝突，而使裴松之注所收錄之史書，有著完全相異的各式記載。相關研究可參王師文進：《裴松之《三國志注》析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7年）。

<sup>68</sup>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123。

<sup>69</sup> 西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2919。

<sup>70</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16。

<sup>71</sup>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白玉崢校點：《史通通釋》，頁7。

「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由引文可以確定，司馬遷、杜預和劉知幾，皆能掌握《春秋》「微婉顯晦」的載筆之體，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sup>72</sup>的外在環境息息相關，此一概念。故「危行」是必要的，但面對不同的外在環境，卻可以選擇「危言」或「言孫」。此種觀念落實到《春秋》書法之上，則成為「懲惡勸善」的目的不變，但卻能以「直書」與「晦書」兩種書寫範式加以表達。劉知幾《史通·直書》：

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兇。<sup>73</sup>

劉知幾論史之為務，首重「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即《春秋》書法「懲惡勸善」之功。認為當以史權制衡政權，讓「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sup>74</sup>使亂臣賊子懼，且劉知幾亦深知直書於「不可為之時則兇」，然其仍以直書、實錄為重。

另一方面，汪榮祖先生論《春秋》書法：

《春秋》筆法只是表達倫理意識，並無歪曲或完全隱藏事實，若王霸之辨，尊王抑霸，並未欲掩蓋王霸之事跡。若以崩諱君王之死，並未真正掩蓋君王死去之事實……《春秋》筆法可說是，在保存歷史真相的前提下，維護儒家倫理的折衷辦法。如楊聯陞所謂，史家鼓勵道德而不失尊重實錄之原則，最多是干擾了事實的呈現，以致於需要避諱學來解套。既可解套，事實也就不會被淹沒。<sup>75</sup>

《春秋》書法重在「表達倫理意識，並無歪曲或完全隱藏事實」，換言之僅是「干擾事實的呈現」，而非「淹沒事實」，是「鼓勵道德而不失尊重實錄之原則」。故《春秋》書法「微婉顯晦」之大者，實乃全身遠禍外，又能留存史實，「懲惡勸善」，無須如齊太史、<sup>76</sup>蔡邕、<sup>77</sup>韋昭<sup>78</sup>等史

<sup>72</sup>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117。

<sup>73</sup>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白玉崢校點：《史通通釋》，頁178。

<sup>74</sup> 如《晉書·桓溫傳》：「（桓溫）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臥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參唐·房玄齡等著：《晉書》，頁2576。引文亦見《世說新語·尤悔》第13條。

<sup>75</sup> [美]汪榮祖：〈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年），頁143。

<sup>76</sup>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參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619-2。

<sup>77</sup> 「邕謝允曰：『……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參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180。

<sup>78</sup> 「『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皓不許，遂誅曜。」參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1462-1464。

官，以身殉道，此正為晦書之必要。

在四史中，《史記》與《三國志》因涉及當代史，故在《春秋》書法的使用上，有其「委婉顯晦」之必要。《漢書》則為受詔而作，<sup>79</sup>並以宣漢為功。<sup>80</sup>故縱有褒貶，但與政權的關係，與《史記》、《三國志》相比，仍是較為緩和。而《後漢書》則是隔朝異代，故能不避忌諱，筆勢縱放、酣然暢論。趙翼對此亦有論述：

雖陳壽修書於晉，不能無所諱；蔚宗修書於宋，已隔兩朝，可以據事直書，固其所值之時不同，然史法究應如是也。<sup>81</sup>

在不同的撰著背景之下，彼此對於《春秋》書法的書寫實踐，顯然呈現方式、與奪輕重會有所不同。趙翼言陳壽有「所諱」，而范曄能「據事直書」，並認史法為當以直書為是。而此種直書與晦書的差別，方才是《三國志》與《後漢書》《春秋》書法的關鍵差異所在。

如前節所論，范曄於〈獻帝紀〉言：「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sup>82</sup>然《三國志》則載：「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sup>83</sup>又言：「曹操自進號魏王」，<sup>84</sup>《三國志》則載：「天子進公爵為魏王」。<sup>85</sup>在「挾天子以令諸侯」<sup>86</sup>的現實環境下，陳壽言曹操乃「天子策命、天子進爵」，當是較合於歷史事實。范曄「自立、自進」，則為《春秋》誅心之筆，承《春秋》「趙盾弑其君」<sup>87</sup>之「不隱」書法。但一如本節前提，范曄乃隔朝異代，秉筆直書自無問題。然陳壽處魏晉之交，何能如此書寫？但陳壽於《三國志·董昭傳》，載董昭建議曹操「宜脩古建封五等」，<sup>88</sup>以立侯國，使龜鼎漸移，並明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sup>89</sup>又在〈荀彧傳〉寫下：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

<sup>79</sup> 《後漢書·班固傳》：「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參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頁1334。

<sup>80</sup> 《漢書·敘傳》：「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參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4235。

<sup>81</sup> 清·趙翼著，曹光甫校點：《廿二史劄記》，頁79。

<sup>82</sup>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頁387。

<sup>83</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37。

<sup>84</sup>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頁388。

<sup>85</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47。

<sup>86</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15。

<sup>87</sup> 參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362-2。

<sup>88</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440。

<sup>89</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441。

心不能平。<sup>90</sup>

陳壽於〈武帝紀〉寫是天子策命，但於〈荀彧傳〉又明確寫下乃「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荀彧反對時，曹操更是「心不能平」。陳壽實已用互見之筆，將此中曲折隱晦呈現，以雜見錯出而見正論。<sup>91</sup>又如〈后妃傳〉載甄后「愈失意，有怨言」被曹丕賜死一事：

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sup>92</sup>

陳壽也在〈方技傳〉中婉曲側寫甄妃當為「冤死」：

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sup>93</sup>

由此些記載觀之，陳壽當是無慚良史，並也熟稔《春秋》書法「微婉顯晦」之義。

魏晉之際因政權不穩定，當朝採「同日斬戮，名士減半」<sup>94</sup>的高壓政治。首當其衝者，正是陳壽等士大夫階層。《晉書·阮籍傳》：「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sup>95</sup> 陳壽所處的魏晉之交代，即七賢佯狂遁世、嵇康廣陵散絕，與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都同樣有著「邦無道」的外在政治壓力。考諸陳壽生平，亦是屢遭廢辱，<sup>96</sup>「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冤之」。<sup>97</sup>故其撰史之時，面對敏感的政治事件，自然不可能秉筆直書，而是採取「微婉顯晦」的晦書之筆。如魏高貴鄉公曹髦之死，〈三少帝紀〉僅載：「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sup>98</sup>高貴鄉公之死，<sup>99</sup>足讓東晉明帝以面覆牀，<sup>100</sup>陳壽卻隻字未提。後人自然多所非議。<sup>101</sup>然以《春秋》書

<sup>90</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 317。

<sup>91</sup> 李笠《史記訂補·敘例》：「史臣敘事，有關於本傳，而詳於他傳者，是曰互見，史公則以屬辭比事而互見焉。以避諱與嫉惡，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隱蔽其事而互見焉。」參清·李笠：《史記訂補》，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陸輯·伍冊，頁 6。

<sup>92</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 160。

<sup>93</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 810。

<sup>94</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 759。

<sup>95</sup>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頁 1360。

<sup>96</sup> 「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參唐·房玄齡等著：《晉書》，頁 2138。

<sup>97</sup> 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634。

<sup>98</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 143

<sup>99</sup> 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載曹髦言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朕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參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 144。

<sup>100</sup>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頁 20。亦見《世說新語·尤悔》第 7 條。

<sup>101</sup> 繆鉞：「書中時有曲筆，替西晉統治者隱惡溢美，多所回護，這不免是《三國志》的一個缺點。」參繆鉞：《〈三國志〉與陳壽研究》，《繆鉞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四卷，



法觀察，陳壽《三國志》實則有系統、有意識地運用《春秋》義例。先是《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sup>102</sup>《左傳》、《公羊》釋之曰：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sup>103</sup>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sup>104</sup>

可知「卒」指「弑也」，乃被殺而亡。二者，《春秋》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sup>105</sup>《左傳》、《公羊》釋之曰：

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sup>106</sup>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sup>107</sup>

可知賊不討則「不書葬」，而壽終正寢會寫地點，「不書地」已存見弑之實。故陳壽雖僅書「高貴鄉公卒」五字，然「書卒」、「不書地」、「不書葬」，實則已用《春秋》書法，直指曹髦乃死於非命、被弑而亡，且兇手尚未伏誅。於「同日斬戮，名士減半」的外在環境壓力下，陳壽《三國志》此處使用《春秋》書法的苦心孤詣，當是值得肯定的。相關問題，已另文析論，故此處也僅簡要略述。<sup>108</sup>要而言之，陳壽處昏亂之世，勢必須以晦書的方式載記敏感事件，避免觸怒當朝，致使書毀人亡，名山不傳。但作為史家，陳壽亦有其「懲惡勸善」、載錄史實的良史之責，兩相權衡下，《三國志》所採取的書寫策略便是「微婉顯晦」的《春秋》書法。

而范曄《後漢書》成於南朝宋，一方面史學本身發展的軌跡乃成熟於六朝，<sup>109</sup>如錢穆先生

頁 263。

<sup>102</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卷 20，頁 350-2。

<sup>103</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卷 20，頁 351-2。

<sup>104</sup> 東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卷 14，頁 183-1。

<sup>105</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卷 4，頁 78-2。

<sup>106</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卷 4，頁 83-1。

<sup>107</sup> 東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卷 3，頁 42-1。

<sup>108</sup> 參拙作：〈曲筆書弑，以史傳真——《三國志》曹髦被弑之《春秋》書法〉，《成大中文學報》53（2016 年 6 月），頁 1-31。

<sup>109</sup> 由目錄學觀察，除史部成立外，《隋書·經籍志》史部也收錄了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兩百六十四卷史著，足可為證。

便言：「中國史學發達，應始東漢晚期，至魏晉南北朝大盛。」<sup>110</sup>另一方面晉室南渡的生聚教訓，也讓南朝士人格外重視歷史，朝廷對史書撰著也相對寬容，如《晉書》便有十八家以上。加之范曄所論乃後漢之世，與當朝政治較為無涉。故范曄自可以其史家識見，直書褒貶。如《後漢書》的論贊，便是范曄最為得意處，其〈獄中與諸甥姪書〉：

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sup>111</sup>

范曄以先序、後論及末贊三體，以「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為宗旨，就史事大加議論，並且頗為得意，自言是「天下奇作」、「吾文傑思」、「無一字空設」。而當前學界普遍對范曄《後漢書》的論贊有很高的評價，如張大可先生便稱其論贊「篇篇精彩，足以奪二十四史之冠」。<sup>112</sup>舉例言之，《後漢書》將皇后列入本紀，范曄持論：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sup>113</sup>

實在是東漢時期，女主專政，權力為皇后與外戚所把持，「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范曄著眼於天下權柄在女主之手的歷史事實，而有所褒貶微言，故別立后紀，此與史公立〈呂后本紀〉，用心可謂合轍。汪榮祖先生便也就此立論，認為范曄比劉勰、劉知幾更為「明通」。<sup>114</sup>又如於〈宦者列傳〉論曰：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sup>110</sup>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三冊，頁141。

<sup>111</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830-1831。

<sup>112</sup> 張大可：《史記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26。

<sup>113</sup>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頁401。

<sup>114</sup> 「范氏之明通，故視二劉多矣」，參〔美〕汪榮祖：《史傳通說——中西史學之比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05。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sup>115</sup>

范曄首立〈宦者列傳〉，並於傳序以宏觀的視野，陳述漢代宦官的啟用始末、體制沿革與利弊得失。全篇行文銳意，論述在理，《昭明文選》亦收入此文，足見其文理之斐然。范曄厲言批評宦官排斥忠公，「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致使「漢之綱紀大亂」。並立論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實與宦官立昏弱之君以掌權，如出一轍。並指出由「曹騰參建桓之策」到「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勾勒出漢末衰亡的某種可能脈絡，並以《左傳》「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作結，這樣的觀察誠有其史家高度與慧眼。但若易地而處，讓范曄置身當世，則如此的厲言批評當權者，不免「直情忤意，參夷五宗」。正因已隔朝異代，范曄方能直書褒貶，無所隱晦。而晦書與直書，可說是《三國志》與《後漢書》，《春秋》書法的差異所在。

## 肆、結論

《春秋》書法作為一經學觀念，當其於史學場域甚或文學場域被接受、使用之時，其觀念的邊界、方法的效用該當為何，是相當引人興味的研究課題。而隨著研究開展，也慢慢可以發現，雖眾人異口同聲地推崇《春秋》書法，然每個史家所理解的觀念、每本史書所呈現的成果卻是不盡相同，「《春秋》書法」其名雖一，然其旨卻是各殊。

而陳壽《三國志》與范曄《後漢書》兩者間的優劣、異同，向來為學界所關注，各家說法亦是莫衷一是。本文則聚焦在兩書《春秋》書法的使用之上，聚焦討論。透過《三國志》與《後漢書》《春秋》書法的敘事表現與書寫實踐，相互發明、比較參照，從而抉微《春秋》書法在史學領域的側面發展。以「《春秋》書法與正統論」與「《春秋》書法的兩種面向：直書與晦書」兩端，加以析論。指出目前學界多以〈武帝記〉、〈獻帝紀〉兩者對比，衡斷陳壽、范曄之優劣，此一標準並不公允。因帝魏或帝蜀的正統論，會影響史家對於人物善惡的判斷，進而呈現出不同的褒貶書法。陳、范《春秋》書法比較之時，正統論與《春秋》書法的複雜疊合，實是必須納入考慮、卻又難以論定的課題，此為破。

再者，《論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種觀念落實到《春秋》書法之上，則成為「懲惡勸善」的目的不變（「危行」），但卻能以「直書」與「晦書」兩種書寫範式加以表達（「危言」或「言孫」）。經由本文析論，可知陳壽與范曄所處時代環境不同，但撰史之時，同是秉持善善惡惡的良史之責，「懲惡勸善」以達《春秋》書法載筆之用。但在載筆之體上，則分別採取了晦書與直書兩種不同的書寫範式。故就結論言，兩人都是有用使用《春秋》書法，此為立。

由此持論，《春秋》書法作為一個可被運用、操作的理論方法，以及其對中國文化的深遠

<sup>115</sup>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頁2509-2011。

影響，確實還有許多可待拓深的餘地。本文將《春秋》經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以《春秋》書法的觀念切入，藉由陳壽《三國志》與范曄《後漢書》對於《春秋》書法的使用，探查《春秋》經學觀念於史學領域的發展與影響。《春秋》書法本就有「善惡必書」、「直筆」與「微婉顯晦」、「晦書」兩個面向，陳壽《三國志》與范曄《後漢書》，在各自的時代背景、思考脈絡與當代關懷下，批判性繼承了《春秋》書法中的一端。由此便也可觀察到，《春秋》書法並非靜態不變的永恆存在，而是會隨著觀念間的互動、發展與接受，進而呈現出核心意涵的連續性，與意義邊界動態性的流動。而研究的最終關懷，仍是經、史、文間的複雜脈絡。《春秋》書法作為一方法學，其效用邊界、概念意涵，在不同文本、甚至不同領域之中，其幽微變化究竟為何。相信相關研究的開展，當能勾勒《春秋》書法觀念建構與書寫實踐的變化軌跡。

## 徵引書目

### 古籍文獻

-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以下《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皆為此本，從省。
- 西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東漢·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東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 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收入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白玉崢校點：《史通通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
- 北宋·歐陽修等著：《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北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北宋·蘇軾著，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
- 清·方苞：《望溪先生全集》，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毛宗崗評訂：《三國演義》，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
- 清·牛運震著，李念孔，高文達，張茂華點校：《讀史糾謬》，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社，1989年。
- 清·王鳴盛撰，陳文和、王永平、張連生、孫顯軍校點：《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 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李笠：《史記訂補》，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
- 清·趙翼著，曹光甫校點：《廿二史劄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 近人研究

- 王文進：《裴松之《三國志注》析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7年。
- 王基倫：〈「《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國文學報》39（2006年6月），頁1-34。
- 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07年。
- 牟宗三：《歷史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
- 李俊安：《《三國志·魏書》書法抉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 李洲良：〈春秋筆法的內涵外延與本質特徵〉，《文學評論》1（2006年1月），頁91-98。
- 李純蛟：《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李景星著，韓兆琦、俞樟華校點：《四史評議》，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
- 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年。
- 沈玉成、劉寧著：《春秋左傳學史稿》，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尚峰：〈百年「春秋筆法」研究述評〉，《文學評論》2（2006年4月），頁178-186。
- 尚鋒：〈從「《春秋》書法」到「春秋筆法」名稱之考察〉，《北方論叢》2（2009年2月），頁10-13。
- 阮芝生：〈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臺大歷史學報》23（1999年6月），頁1-59。
- 林盈翔：〈曲筆書弒，以史傳真——《三國志》曹髦被弒之《春秋》書法〉，《成大中文學報》53（2016年6月），頁1-31。
- 林盈翔：《《三國志》「春秋」書法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
- 林聰舜：〈《史記》的「微言」敘事——「書法不隱」與「隱」的統一〉，《清華中文學報》5（2011年6月），頁89-122。
-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張大可：《史記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
- 張金梅：〈近三十年國內外「《春秋》筆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蘭州學刊》155（2006年8月），頁54-57。
-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年。

張高評：〈《春秋》筆削見義與傳統敘事學——兼論《三國志》《三國志注》之筆削書法〉，《文史哲》1（2022年1月），頁1-14。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

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9年。

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

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年。

陳義彬：《陳壽《三國志·魏書》之《春秋》書法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黃梓勇：〈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5（2009年9月），頁161-188。

楊凱嵐：《《三國志》的「微言」敘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楊朝蕾：〈論范曄《後漢書》帝后紀論中的「春秋筆法」〉12：4（2010年12月），頁87-91。

楊濟襄：〈孔廣森《公羊通義》與何休《公羊解詁》釋經觀點之異同〉，《經學研究集刊》13（2012年10月），頁67-100。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趙友林：《《春秋》三傳書法義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趙令揚：《關於歷代正統問題之爭論》，香港：學津出版社，1976年。

劉咸炘著，黃曙輝編校：《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劉德明：〈「王霸之辨」在《春秋》解經中的運用與反省——以朱熹及張治的觀點為核心〉，《中正漢學研究》27（2016年6月），頁117-142。

潘銘基：《《漢書》及其春秋書法》，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繆鉞：《繆鉞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鍾書林：《《後漢書》文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鍾書林：《范曄之人格與風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國史學觀念探討之一》，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79年。

〔日〕渡邊義浩：「陳壽の『三国志』と蜀學」，收入三國志學會編：《狩野直禎先生傘壽記念三國志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

〔美〕海登·懷特（Hyden White）著，劉世安譯：《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

〔美〕海登·懷特著，董立河譯：《話語的轉義——文化批評文集》（*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北京：大象出版社，2011。

〔美〕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科院，2003 年。

〔美〕汪榮祖：〈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 年。

〔美〕汪榮祖：《史傳通說——中西史學之比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英〕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賈士衡譯：《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 年。